

《南王北马》之说——回忆与马兴国先生的学术交往史事

王 勇（浙江大学）

何时何地与马兴国先生相识，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。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一九九五年一〇月他主持召开的《中国日本研究杂志历史回顾与展望》学术研讨会。

二〇余年前，随着中国《改革开放》政策的推行，日本研究机构的布局也从政府规划向市场需要转化，尤其是海外贸易活跃的东南沿海一带，新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日本研究机构，因此这次会议汇集了全国二〇余家新老日本研究机构代表，堪称规模空前。

马兴国教授任所长的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，属于老蠹的政府定点的研究机构。我任所长的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，则算是地方高校自建的研究机构。马兴国教授在开幕式致辞及会议论文集序言中提到《南王北马》一词，引起与会代表的关注。

马兴国教授虽年长我一〇载，但在上世纪九〇年代，我们两人都属于日本研究的新生代，前辈学者北京大学严绍璁教授、中国社科院汤重南研究员等，本着奖掖后学、提携新进的精神，对《北方的马兴国、南方的王勇》寄以

厚望，不经意间说出“南王北马”之语。

当然，我们都有“自知之明”。前辈的赞许并不代表我们取得了多大成绩，更多的是对我们的激励。但“南王北马”之语确实促使我俩南北联手，合作做成了几件至今仍值得留念的事情。

首先，上世纪九〇年代初，马兴国着眼于国内日本研究的基础工程，立志编写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工具书，他的倡议获得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先生支持，两人联袂主编《中日文化交流事典》，我本人接到邀请后也积极响应，担任“艺术卷”主编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，他的统筹能力、全局观念、创新意识令我敬佩。

其次，一九九五年在丹东举办的“中国日本研究杂志历史回顾与展望”学术研讨会期间，马兴国专门找我商议一事，即中西进先生即将从日本国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退官，我们这些受其学恩的中国弟子辈，是否应该编一部纪念文集？中西进先生在任期间，严绍璩、马兴国、王晓平及本人，皆有幸受邀到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任职，大家商议后决定共同出资出版纪念文集。此事由马兴国发起并统筹，记得我们两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来回游走，他一直定不下书名，我突发灵感提议取名《比较文学·中国与日本》，这个书名最后被大家采纳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出，马兴国很重感情、有恩必报，我们也为他的热情所感动，大家合力做成此事。须知二〇多年前四个人合资出版一本书，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几乎每人要花去将近一年的工资。

最后，大约在筹划中西进先生退官纪念集的同时，我与中西进先生在策划编辑出版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》，该丛书共分历史、文学、思想、艺术、书籍、人物、科技、民俗、法制、宗教一〇卷，我与中西进先生无锡的某个宾馆讨论分卷主编时，几乎同时推举马兴国担任《民俗卷》主编。因为我们都熟知他于一九八八年出版的《千里同风录》，是《民俗卷》主编的不一人选。

回忆与马兴国教授的学术交往，虽然坊间有《南王北马》之说，但我一直是兴国兄《马首是瞻》，把他视为学习的榜样与追赶的目标。

一年多前与马兴国先生见面，虽然听力不如当初，但仍然意气奋发，似有退休后埋头著述之规划。然而，天降斯人而不假以年，上月惊闻《北马》仙逝，学界为失去一位旷世英才而悲伤，本人则为失去一位学海同舟而倍感凄凉。

愿马兴国先生天国安眠！

（丁酉仲冬吉日）